


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

当代中国经济

Contemporary Chinese Economy

主编 > 赵满华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9年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

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

当代中国经济

Dangdai Zhongguo Jingji

主编 ▶ 赵满华

副主编

张明

张明

张明

张明

张明

张明

张明

张明

张明

张明

张明

张明

张明

张明

张明

张明

张明

张明

张明

张明

张明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经济 / 赵满华主编. --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577-0069-0

I. ①当… II. ①赵… III. ①中国经济-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2738 号

当代中国经济

主 编: 赵满华

出 版 人: 孙志勇

策 划 人: 王宏伟

责任编辑: 解荣慧

装帧设计: 阎宏睿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133 (发行中心)

0351-4922085 (综合办)

E - mail: scb@sxjjcb.com(市场部)

zbs@sxjjcb.com(总编室)

网 址: www.sxjj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38 千字

印 次: 1-3000 册

版 次: 2016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77-0069-0

定 价: 39.00 元

《当代中国经济》编委会

主任：张崇康

副主任：王文寅 王文昌

成 员：靳共元 原玉廷

赵红梅 武巧珍

程新征 王 梅

李恩平 刘淑清

主 编：赵满华

副主编：张晓林 李 定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代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不断增强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是题中应有之义。系统地了解这一学科的基本脉络,准确地掌握它提供给我们的深邃思想,熟练地掌握它所使用的宝贵的科学方法,对于我们理解社会发展和经济运行的规律,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沿革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有悠久历史的学科。了解它的前因后果,掌握其发展的基本脉络,有利于我们保持清醒头脑,更加自觉地站在历史的高度,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去认识现实的经济生活。

(一)马克思以前的政治经济学

在古希腊奴隶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就有了“经济学”这一词语,主要用来表述奴隶主的“家庭经济管理”的含义。15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在欧洲流行的重商主义,最早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探讨,其主要特点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商

业领域,认为这是财富的主要源泉。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莱田出版《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第一次使用了“政治经济学”这一名词,体现了穿着封建外衣的新兴资产阶级对社会财富的渴望和理解。随着时代发展,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日益成为生产的主要形式。资产阶级为了同封建势力做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775年卢梭为法国《百科全书》写了“政治经济学”条目,彻底把政治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区分开来。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称《国富论》),正式宣布政治经济学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支柱。1817年代表更为激进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大卫·李嘉图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把古典政治经济学推到了这个阶段所能达到的最高峰。

(二)马克思使政治经济学发生伟大的革命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开始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由这个制度内部产生的矛盾不断激化。1825年世界上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1847年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日趋激化。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和古典经济学背道而驰的庸俗经济学。它的基本特点就是抛弃劳动价值论,抹杀阶级利益对立,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19世纪30年代以后,庸俗经济学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伴随着庸俗经济学的产生,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前者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反对大资本的剥削,同时又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即私有制。后者对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但由于不能脱离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畴的限制,无法找到未来社会真正的出路,只能把自己置身在空想状态之中。

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伟大革命。这一革命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以往的经济

学说大都把它的研究对象确定为物或者财富，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把它确定为人和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第二，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二重性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以往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古典经济学家曾经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这是有巨大功劳的，但是他们受阶级立场和方法论所限，无法解释劳动因何、为何以及如何创造价值，从而导致他们所坚持观点的最后破产。而马克思提出并说明了劳动二重性原理，不仅科学说明了价值转移和价值形成过程，更有效地构建起剩余价值的理论大厦，从而完成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伟大革命。第三，强调了这一学科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以往的政治经济学都极力掩盖这一学科的阶级性，调和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让社会在全能的“神”的保护下，和平地得到每一个人所能得到的一切。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强调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并把它和科学性高度统一起来，从而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三) 马克思以后的政治经济学

19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工人运动日益高涨，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广为传播，动摇着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统治。在这种形势下，资产阶级经济学彻底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外衣，建立起新的庸俗经济学派，并朝着两个方向发展。

第一个方向是历史学派，出现在德国，先驱者代表是乔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其主要特点是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革命运动。按时间顺序和观点区别，又可细化为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新历史学派主要活动于19世纪40~70年代，以威廉·罗雪尔为创始人。其主要观点是用历史归纳法反对抽象演绎法，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用生产力的培植反对交换价值的追求，用国家干预的观点反对自由放任的经济。19世纪70年代以后，以古斯塔夫·冯·施穆勒、阿道夫·瓦格纳等人为主要代表的新历史学派，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被人们称为“讲坛社会主义”。

第二个方向是边际效用学派，出现在英国、奥地利、法国，其主要特点是以边

际效用价值反对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卡尔·门格尔和里昂·瓦尔拉斯。他们同时以不同的术语，独立地论证了同一个思想：商品是人们对商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价值量取决于物品满足人的最后或最小欲望的那一单位的效用。1844年，奥地利经济学家把这个效用称为“边际效用”，此后被广泛应用。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一学派又形成两大支流：一支偏重于用心理分析方法建立理论体系，另一支则强调用数学方法进行表述与论证。

无论是历史学派还是边际效用学派，他们的基本观点都是从唯心主义出发，否认社会存在普遍规律，否定客观价值存在，强调伦理道德、法律和主观心理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决定作用，把孤立的“鲁滨孙”式的人物当作社会典型，鼓吹超阶级、超社会形态的分析，特别是边际效用学派用数学方法烘托的“边际革命”，不仅否定了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学说，而且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成为以后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的经济学发展的基础性理论。

(四) 20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急剧尖锐化，战争和危机接踵而来，沉重打击了资本主义制度。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1933年爆发了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随后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一系列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政治经济学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巨大变化。列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阐明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考察了生产集中、资本集中和资本积累的趋势，确立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是垄断，为无产阶级认识时代特征奠定了科学基础。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上取得一国或几国胜利的理论，并成功领导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帝国主义包围下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毛泽东对帝国主义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

做了深刻分析,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开辟了新的途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所有这些重要的理论贡献都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增添了新的篇章,丰富了这一学科的内容。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也有了新的变化。

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边际效用理念的基础上,借助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为核心的庸俗经济学体系,来论证通过自由竞争可以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均衡发展”。20世纪30年代的琼·罗宾逊和爱德华·张伯伦又提出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的理论,补充了马歇尔的学说。马歇尔的观点在庸俗经济学中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

1929~1933年的大危机对此提出了挑战,凯恩斯是最有影响的挑战者。他从有效需求不足出发,认为投资和储蓄不可能自动形成均衡,主张国家直接干预经济。这正好符合垄断资产阶级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因而取代马歇尔成为主流经济学长达30年之久。从20世纪60年代起,以经济衰退、失业增多和通货膨胀为特征的“滞涨”现象严重,迫使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再一次改弦易辙,寻求新的解释,形成了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罗宾逊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就被推崇的经济自由主义在此时重新兴起,出现了货币主义、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和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三大分支,他们主张限制甚至消除国家干预。还有在20世纪初就出现的美国制度学派以及后来的新制度学派,从制度层面上剖析社会病症并提出处方。此外,瑞典学派W.W.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学说和J.A.熊彼特的“创新”学说都有一定的影响。客观地说,这些学说无论从微观还是从宏观角度看,都对社会化生产和发达的商品经济运行进行了一定的解释,包含有科学合理的成分,可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吸收和利用。但从整体上看,这些学说的目的在于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根本使命是不一样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也是清除各种剥削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过程。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成为建

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武器,从而去完成改革和发展的历史重任。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历史的必然。从中国历史上丰富的经济思想到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再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活在黄土地上的中国人最终找到了发展崛起的思想武器。无数仁人志士的努力已证明,只有依靠它,我们才能实现世代所企盼的中国梦。

(一)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历史上有丰富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一般来说,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包括“道法自然”的思想、义利思想、富国思想、赋税思想、奢俭思想等,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阶级服务的,与近现代资产阶级扩大商品交换,发展资本生产的要求,具有本质上的不同。资本家只有对剩余价值不懈追求,才产生了对生产扩大的无限动力,最后也才能取得对封建地主的胜利。

19世纪中叶,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在西方殖民主义的隆隆炮声中,一批有识之士认识到闭关锁国不能制夷。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的失败惊醒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及时掌握西方各种学说,并以此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马克思的学说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人们接受。1896年严复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896年李提摩太、蔡尔康等人在《万国公报》上介绍马克思的学说,1906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人朱执信在《民报》上对《资本论》这一巨著做了解释。这一时期孙中山先生也多次提到马克思的学说。特别重要的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对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学说和《资本论》的传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无产阶级开始

登上历史舞台。1919年5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922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和第六号上发表《社会主义批评》和《马克思学说》，在此前后，邓中夏等人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望道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所有这些活动，不仅广泛传播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批知识分子包括郭沫若、陈启修、侯外庐、王思华从事秘密翻译《资本论》的工作。1938年9月郭大力和王亚南历经十余年，终于翻译出齐了《资本论》的三卷本。党的出版机构——解放社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出版了多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供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使用。到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都有了中译本。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一些经济学人开始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来研究中国的经济状况，剖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经济原论》《中国经济论丛》，许涤新的《官僚资本论》等著作，是这一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在各大学的讲坛上，老师和学生们都在不懈研究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各个革命学校，《资本论》及有关书籍是重要教材和必读参考书目。学员通过学习，懂得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了剥削性质，增强了阶级觉悟，提升了工作水平和领导能力，更加自觉地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三)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到空前的发展。首先，党中央非常重视经典作家原著的出版工作。1953年党中央决定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陆续完成了卷帙浩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的翻译，还编辑出版了各种选集和专题文集。其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领袖人物高度重视并积极研究新中国建设时期的理论问题。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理论著作，不仅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经济建设的全局发展做出了战略规划，更重要的是从马克

思主义原理出发,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对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再次,有一批著名的学者和理论专家活跃在理论界杂志和高校课堂上。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学习》等杂志上经常刊登王惠德、于光远、蒋学模等普及政治经济学常识的文章,中央及各地党校和大规模调整后的高等院校,也聚集了郭大力、王亚南、宋涛等一批名家,面对面地向党的干部和青年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教材。它为学习这门科学提供了便捷的途径,但也把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或不准确的理解带给了我们。

从195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大跃进”时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开始具有更多的政治色彩。在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总路线”指导下,经济理论界围绕着“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多快好省与经济规律的关系”“政治挂帅与经济利益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左”的倾向逐渐占据上风。随着“大跃进”以后的经济调整及尖锐的党内斗争,经济理论研究中的“唯政治”倾向越来越严重,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极端。

1966年5月,中国进入“文化大革命”的非常历史时期,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教育、科学都有了较大变化。这一时期,事实上已经不存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一些所谓的经济理论,只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对一些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歪曲与篡改。例如,大批“唯生产力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按劳分配”等观点,集中体现在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受“两个凡是”观念的禁锢,政治经济学也处于僵化和停滞状态。这种情况,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发生彻底改变。

(四)改革开放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蓬勃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解放思想的大背景下,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体系,大大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它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实践的智慧 and 心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个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科学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等重大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二是大量引进、吸收和消化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原理和方法,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创新与突破,都与此难以分开。在对商品和价值规律的理解上,在对计划和市场的作用的判定上,在市场化推进过程中,我们借鉴西方经济学,更加准确地推出了经济改革政策。我们还会遇到诸如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劳动力转移、失业、非公经济增长等多种问题,仍需要参考西方经济学已经涉猎过的论题。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做了研究,这是一种历史的财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此批判地吸收,不仅增强了解释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更是这一学科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然举措。

三、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重大问题

我国的改革和发展,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理论突破的基础上才得以顺利进行的。无论是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离不开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一个民族要想站在工业时代的前沿,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理论产生于实践,又指导着实践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多端,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我们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境地,发展为经济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二的大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收入差距拉大、经济失衡、结构调整任务很重,也是不争的事

实。对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全民共享改革的红利以及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重大课题,首先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高度给出明确的回答。

(一)如何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涉及的最重要的基本概念之一。解放生产力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去理解的,而发展生产力则是直接从人和自然关系的角度去理解的,二者是矛盾的统一体。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成立了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规章制度、废除烦琐的行政审批,就是把生产力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大力提倡在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把发展生产力的事情做好。当前中国已经从低收入发展阶段,进入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遇到了许多新问题。经济新常态、创新驱动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还有“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等,就是发展生产力的具体行动。

(二)如何界定市场和政府的功能,并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和核心问题是如何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功能并科学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有些人根据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政府和市场的功能是相互否定的,二者必居其一,发展市场经济,就不能有政府作用。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事实上回答了这是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确认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又阐明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和突破。

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本意在于尊重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突出市场的自主性,既包括价格体系自发地在系统内部形成,更意味着它决定资源配置的方向,所有这些过程都不受政府的不当干预。但这并不是说,从此就不要政府了。相反,政府还要更好地发挥作用。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正确界定政府的功能和划清它的职能界限。凡是市场能做的或者比政府

能做得更好的,都要回归市场本位,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政府也必须真正“强”起来。当然,这个“强”也是有界限的。首先,在公共资源领域,政府要“强”,此处的资源配置不能交给市场去做。其次,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要“强”,促进公平正义在社会大众中实现。再次,在涉及战略发展、重大布局、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上,政府也要“强”,确保有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环境。在明确界定二者的功能的基础上,要认真处理好二者的关系,特别需要把握好衔接环节,避免产生摩擦和扯皮现象。

(三)如何理解混合所有制与公有制的关系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私人资本相互融合所形成的混合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提法。过去人们把基本制度理解为公有制企业和非公企业的外部并存,并要求确保公有制企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要保持优势,以确保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性质不发生根本变化。现在根据变化了的实践,需要进入一个企业内部去理解公有制的存在与实现。

毫无疑问,从总体上看,在混合所有制中保持公有资本占优势的数量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一定要注意,混合经济的本意在于让各种经济成分进一步活跃,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要对现存的混合经济做适当的划分,以便更准确地理解混合经济中公有制的实现问题。混合经济中,一类是市场竞争性的,另一类是社会公益性的。对前一类来说,公有资本的功能也是趋利性的,而它的公有制性质通过缴税、缴费等方式,迂回地得到体现;而对后一类来说,则较多地通过非市场的手段直接实现公有制。不管对哪一类来说,无论是公有资本还是私人资本,面对混合经济这个实体,大家都是公平和平等的同一身份。公有资本和私人资本一样可以进入竞争性的混合经济中,共同进行趋利性活动;而私人资本同样可以和公有资本一样,以参股、合作、经营等方式进入社会公益性企业,直接为社会提供服务。这样,既保证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又充分调动起各

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

(四) 如何理解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的关系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这是广为人知的观点。但由于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采取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相应地在分配领域也就实行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方式,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调动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包括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由各自的生产要素市场决定。这就要求我们回答一个现实问题:按劳分配如何在这种收入分配体制中体现主体地位?

首先,总体上说,要素参与分配,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会做大整个社会经济的蛋糕,因而从根本上有利于劳动者。其次,在生产领域即国民收入的首次分配领域,适当进行调控,把由于要素参与分配而在事实上拉大了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和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再次,要通过国民收入再次分配,有步骤地增加劳动者的福利,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弥补由于要素参与分配带来的分配失衡和不公的不足。

(五) 如何理解供给侧和需求侧问题

供给和需求是不可分割的一对矛盾。在经济学中,它首先涉及平衡问题,这是宏观分析的重要环节。但事实上,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它们各自都有独立运行的规律和机制,而且,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对二者的理解和做出的经济对策也有很大的区别。

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建设把注意力放在需求侧方面,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产品短缺、物资匮乏,不得不把注意力首先放在解决需求问题上。粗放生产、大干快上,辅之以物资需求管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而且,这种做法成效明显,并取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使中国经济总量很快位居世界各国前列。

但是,所积累的问题也会逐渐显现。首先是结构性短缺。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产品质量差、产品不安全、技术含量低以及效率低、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与此同时,又存在低端产能或供给过大过多的现象。这也是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现象之一。其次是供给侧动能太弱。企业对技术改造、升级换代、核心技术重视不够。企业家精神颓废,原始创新意识缺乏。这不能不影响未来经济的走向和前途。把注意力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个客观经济过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通过着力点的转换释放出新生产能力,为持续发展数十年的中国经济寻求新常态下的新增长极,主要目标是要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改革主要任务涉及科技创新体制、企业的精细化管理和激励性制度的建设。

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否定需求侧的作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调结构,优化重组企业,给实体经济减压降负,都是在化解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上做文章,属于供给侧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必须从需求的角度强调市场竞争的作用,市场内部的竞争形成产品的市场价值,市场外部即行业之间的竞争则会形成生产价格。依靠全方位的竞争,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只有这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有较好的效果。

以上所列的问题是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迫切需要解释的问题。事实上问题远不止这些。需要理论界做出合理解释的,还有公平与效率问题、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农村土地流转和新农村建设、金融与资本市场建设、国际贸易与“一带一路”的建设等。研究这些问题,可以感受到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处于指导思想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不断发展。理论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正确的理论会给我们指出前进的方向。只要我们勇于探索,勤于实践,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明天就一定会到来。